

艺起前行 优秀新创舞台作品上海展演特别报道

常州市滑稽剧团来沪演出《陈奂生的吃饭问题》——

小剧团、小剧种，大题材、大勇气

■本报记者 王筱丽

“小剧团、小剧种，大题材、大勇气。”文艺评论家方家骏这样评价常州市滑稽剧团创排的滑稽戏《陈奂生的吃饭问题》。作为“艺起前行”优秀新创舞台作品上海展演首部亮相的外地剧目，该剧上周连续两晚在上海大剧院上演。这部荣获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的舞台作品，来自一个25人的小剧团，用两个小时“笑中带泪”的滑稽戏，完成了当代农民对生命、对时代变迁的检视与思考。

如何用“接地气”的喜剧完成重大主题创作？如何在现实题材书写中，体现民生关切、时代观照与人文关怀？观演后的创作经验交流会上，上海的专家学者纷纷表示，《陈奂生的吃饭问题》在当下戏剧创作有相当独特的启示意义和可贵的借鉴价值。

“这对当下重大题材作品创作中时有所见的同质化现象，是一个可喜的反拨”

“吃饭是个问题，问题不是吃饭，不是吃饭问题……”主角“陈奂生”一开场就用一段喃喃自语抓住观众的注意力。“陈奂生”这个人物对许多人来说并不陌生，原型出自于著名作家高晓声小说《陈奂生上城》中的主角，是处于历史交接期一代农民的缩影。而《陈奂生的吃饭问题》选择聚焦其“漏斗户”这一形象，延续原著人物的性格逻辑和特征，创作出新故事，以表现改革开放40余年间中国农民的命运变迁。

当以幽默著称的滑稽戏遇上厚重的现实题材，如何显得不突兀是摆在创作者面前的第一道难题。“以往滑稽题材很少触及民生问题这类‘大’的题材，就怕喜剧效果出不来。”该剧编剧之一张军坦言。而这种碰撞也引起了上海专家的关注。“农民与土地的死生关系让这部戏永远不过时。”上海市京昆艺术发展咨询委员会主任马博敏表示，“但要讲好这样的故事并不容易，不仅要深刻理解农村的土地政策、深刻理解中国农民，而滑稽戏的演



“艺起前行”优秀新创舞台作品上海展演剧目《陈奂生的吃饭问题》在上海大剧院上演。图为剧照。

绎起到了‘接地气’的作用。”

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领导小组副组长、著名文艺评论家郗国义指出：借助和丰富“陈奂生”这个当代文学史上的典型形象，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的巨大变化，以诙谐夸张的艺术手段，生动形象又不至深刻地在戏剧舞台上呈现出来，这是这部剧目最突出的亮点。这对当下重大题材作品创作中时有所见的同质化现象，是一个可喜的反拨。他说：“这再次促使我们思考：选题的确立，如何凭借和开掘地域的文化人文资源；形象的塑造，如何注重思想的深刻和故事细节的血肉丰满；而艺术的呈现又怎么雅俗共赏，满足更多受众的需求……”该剧的成功，在这些方面带来了颇多借鉴和启示。

陈奂生一家人的“吃饭问题”，背后折射的是一部家族史，更是中国乡村史、社会史，上海市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涌豪认为：“常州这样一个小剧团，

能够以滑稽戏的形式参与到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思考中来，是了不起的。”

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，先求“细小”才能“宏大”

舞台上，苏南农村民居剪影、散落的农具物件以及简单的桌椅摆设，犹如一幅乡村生活风俗画，透着乡野的本真与自然，更是艺术出现上的真实与朴拙。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演出里，“陈奂生”的扮演者张怡没有片刻下台，他从角色的青年时期一口气演到78岁，而一次次时间“闪回”的倒叙设定，全靠演员对形体和嗓音的控制来实现。张怡说，要把握好不同年龄段的特征很难，但最难的是要演出陈奂生对底线、对土地坚持——面对傻妹死前的托付，面对吴书记对自己生活的关心，面对儿子陈两贪污的200万元公款，外表胆小怕事、唯唯诺诺的陈奂

生如何迈过一道道生活的坎儿、时代的坎儿，从中照见的是中国农民身上朴实、善良、真诚的精神特质。

文艺评论家荣广润认为，陈奂生艺术形象得益于文学底本的助力，续写的人物故事则提炼自改革开放40多年，中国农民经历的悲欢离合、时代变迁，浓缩在了“吃饭问题”里，“这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创作”。当下有些创作“从概念出发，从世界出发，从几个人物的英雄行为出发，但是比较少的是从生活出发，从艺术的角度出发”，从这个角度看，陈奂生应该值得好好学习，提醒创作者“应该更多的从艺术的角度看待生活，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的营养”。

方家骏也认为，这个戏再次提醒了创作者们，戏剧不可违背的一个规律，就是一个以小见大的艺术操作规律。“凡是比较好地遵循了这样一个规律，成功率可能就大一些。为什么有些现实题材的作品在观众眼里不感人，恐怕就因为它铺展得太大，没有从人的心理，从细小入微的方面去切入，去展现它背后宏大的历史感。”

熊月之：历史中的大与小——从四行仓库抗战说起

“光影·电影讲堂”推出第一讲

由中共杨浦区宣传部、文汇报社和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联合打造的“光影·电影讲堂”，推出“红色电影”“大师”“青年艺术家”“海派电影”等系列主题，通过主题演讲、嘉宾对话和影片观摩等形式，邀请一流导演、编剧、制作人和学者，解读电影背后的故事与历史，构建光影之上的对话交流空间。首期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、上海文史馆研究馆员、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熊月之作为《历史中的大与小——从四行仓库抗战说起》的主旨演讲。

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，说到抗日战争，我们中国人有四个始终铭记在心的特殊日子：“九一八”“一·二八”“七七”和“八一三”。从历史上“大”和“小”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原来将抗日战争史分成全面抗战和局部抗战，发生在1931年和1932年的“九一八”“一·二八”与发生在1937年的“七七”“八一三”就分在了两个不同时期。而现在统称的“十四年抗战”就将这四个日子归在了一个时期。

“一·二八”与“八一三”都直接与上海有关，起到扭转全局的作用

在上述四个日子中，“一·二八”与“八一三”（即1932年1月28日与1937年8月13日）直接与上海有关，热映电影就聚焦了八一三事变后的淞沪会战尾声的四行仓库保卫战。

这两次战役是在不同的起因、背景和目下发生的。“一·二八”事变发生在“九一八”事变以后，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，策划建立伪满洲国。这一严重侵略行动导致了世界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利益不平衡，更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。为了转移目标，日本侵略者通过挑起事端以转移视线。因上海有着相当特殊的地位，是西方各国利益所在地，能起到其他城市无法起到的作用，所以，日本侵略者选择在上海发动战争，具体挑衅位置就在杨浦区的马玉山路（今双阳路）。马玉山路上的三友实业社，是中国民族资本家所办的一个企业，与日本存在市场竞争关系，为日本人所恨。

当时，三友社工人组成了抗日救国会和三友抗日义勇队，400余人每天在上班前操练。西郊日商东华毛巾厂驻有日本海军陆战队，设有瞭望台，看到三友毛巾厂的行动，恨得牙痒痒，视为眼中钉。1932年1月18日下午，天崎启升等五人以举行“寒中修行”为幌子，在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毛巾厂门前敲鼓击钟，还向厂内投掷石块，义勇队成员立即跟踪其后。天崎启升等人见工人尾随而来，便向马玉山路租界方向逃窜，逃到赵家宅附近时，遭到工人的拦截盘查。此时，由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先收买和雇佣的一批打手，化装成工人模样混入义勇队中，用石块猛砸天崎启升等人，造成日僧一死二伤。打手们见日僧或死伤或逃逸，便一哄而散，将责任嫁祸于工厂工人身上。这便是轰动一时的“日僧事件”。日本发动战争就以此为借口。

1937年淞沪会战，是当时中方主动调整抗日方略的结果。“九一八”事变以后，日本由东北，而华北，步步南侵。中方判断，日本下一步侵略战略便是沿着平汉铁路南下，从武汉，再沿粤汉铁路南下广州。这样，日本将依托占据贯通南北的铁路大动脉，将中国分隔东西两块，进而凭借其强大的军事优势，将主要依托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南京国民政府消灭，最终灭亡中国。为了粉碎日本的图谋，中方决策在上海与日本会战，将日本兵力调往南方。这样，在上海能战最好，不能战，则且战且退，迁都重庆，依托西南大后方，用空间换时间，拖住日本，打持久战。决战地点选择上海，因为这里是日本必争之地，也是西方各国利益所在。中方寄希望于“九国公约”相关国家如英、美、法等于干涉或调停。在当时中国，能起这样作用的战略据点，只有上海。

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二十多次会战中，发生最早、最为惨烈、最具战略意义的会战之一。日本所谓速战速决的幻想就此破灭，从此被拖入持久战的泥潭。中国一扫以往“东亚病夫”“一盘散沙”形象，万众一心，敢打敢拼的抗战精神，呈现在全世界面前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中国在淞沪会战中达到了调整抗日方略、振奋民心的目的。可以看到，这两次扭转全局的战争都与上海有关，这与上海这座城市的特殊性有关。

历史中的大与小：人口面积小，在全国的经济比重，大，与世界联系大

就历史的大与小而言，上海的面积、人口在全国的比例很小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面积不到全国的万分之一，人口不到全国的百分之一。但是，就上海在当时全国经济中的比重而言，很大。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，上海已是超过35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，不光是中国最大，也是远东最大城市之一。其时，上海城市人口，几乎等于南京、北平与天津三个城市人口的总和。抗日战争前夕，除东三省外，全国工厂数的30%在上海，工业产值50%以上出自上海。许多达官贵人将家安在上海，将钱存在上海，将产业置在上海。上海成为全国财富汇聚之区。

举例来说，从晚清到北洋政府，再到南京国民政府，包括江南制造局、轮船招商局等涉及国家重要经济命脉的设施都在上海。民间资本如李鸿章、曾国藩，他们的私人投资也都在上海。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，但他家迁到了上海，资产也都在上海。阎锡山的主要财富也主要集中在上海。

从上海与世界联系角度看，占比也很大。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，外国对华出口贸易和商业总额的81.2%，银行投资的79.2%、工业投资的67.1%、房地产业的76.8%，均集中在上海。1936年，上海对通商口岸贸易总值，占全国75.2%，1940年比重上升到88%。与此相一致，上海也是列强在中国的据点。据研究，1930年，英国在上海投资占其在华总投资的76.0%，美国在上海投资占其在华总投资的64.9%，法国在上海投资占其在华总投资的40.9%，日本在上海投资占其在华总投资的66.1%（东北除外）。

因此，上海是当时的中外利益共同体，既像一个多国共有的珠宝店，又像一个国际信息汇聚之地。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包括中国的信息情报都汇聚在此，产生了溢出效应。正因如此，世界各国的情报组织，如左尔格情报网就经常在上海探听日本在中国的战略动向，也探听德国人的战略动向。

上海的“孤岛”奇观：苏州河一边炮声震天一边笙歌达旦

因此，上海表现出相当的特殊性。首先它是中西利益的共同体，当时的上海其实是“三个上海”，即由公共租界的上海、法租界的上海和华界的上海共同组成，它们各自拥有独立的政府、法院、教育、卫生。当战争打响后，每个地方各自为政，只保护自己的“和平封锁”，即禁止中国船舶的海上交通运输，对第三国船只虽时有阻拦，但并不完全禁止进出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，进出上海港的轮船吨位中有将近六成属于中日以外的第三国。当然，日本人也知道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挂着外国国旗的中国船只。

各方还在上海争夺政治与文化影响力。左翼文化兴盛一时，带有强烈“鲁迅风”的杂文，反映沦陷区人民生活与斗争的戏剧，梅益等主编的报告文学《上海一日》，都有影响。以演出反映抗战生活、借古讽今戏剧为主的大小业余剧团，有一百多个。当时的上海租界，繁荣到难以想象的境地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，被敌方占领的大城市，无论是北平、南京、香港，还是布拉格、华沙、巴黎，都没有与上海类似的情况出现。

上海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特点与作用，交互影响，相互作用，使得上海这座城市，要悲壮有悲壮，要柔情有柔情，要崇高有崇高，万象杂陈，令人目不暇接。人间一切正剧、悲剧、喜剧、荒诞剧，在这里都有上演。于是，上海被涂上神奇、怪诞、梦幻乃至幽默的色彩，难怪被日本人称为“魔都”，也难怪斯皮尔伯格的《大闹天宫》、李安的《色戒》、周润发领衔的《上海滩》，都要以上海为背景。

这便是上海之所以为上海的地方。（李念、袁璋璐整理）

上海音乐厅举行闭关修缮一年半后的首场演出，谭盾新作《武汉十二锣》前晚上演

12面武汉大锣在上海舞台传递爱和必胜信念

■本报记者 姜方

奏生日歌敲武汉锣，开展东西音乐对话

早在今年2月，谭盾在比利时执棒安特卫普交响乐团首演他的抗疫新作《武汉十二锣》。因疫情对作曲家的心灵产生巨大震动，从纽约飞往比利时的航班中，无法入眠的他一气呵成。“作为楚文化中心的武汉，是中国最优质的锣、鼓、镲的制造地之一。”谭盾说，“武汉的大锣在世界各地的交响乐团中被用来演绎贝多芬、马勒等大师经典，从柏林爱乐到纽约爱乐，从荷兰皇家剧院到费城交响乐团，无一例外都是在使用武汉大锣。”因此，《武汉十二锣》通过武汉铜锣传递的独特声音，让世界各地听众理解武汉，支持中国。

前晚的音乐会上，谭盾精心编排了五首曲目，女中音朱慧玲、青年琵琶演奏家韩妍、古筝演奏家苏畅携手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上演。开场曲目是

谭盾谱写的《节日序曲》，气势雄伟、磅礴，音色壮观、优美。音乐会也有多部西方经典音乐作品的演绎和改编。斯美塔那《沃尔塔瓦河》、鲍罗丁《鞑靼之舞》情感充沛，琵琶—古筝双重协奏曲《巴赫与小白菜》，则将巴赫的复调音乐与中国民歌小调《小白菜》相融合，既充满活力又不失传统化色彩。

谭盾还特别为上海音乐厅90周年送上祝福——根据巴赫的C大调前奏曲改编创作的《天地再生：生日快乐》，预示着从人类到宇宙，历经挫折后都将迎来充满希望的新生。“上海音乐厅焕然一新的华丽外观、留给观众和艺术家的舒适空间都让我很兴奋。”演出前，谭盾对修缮重开的音乐厅十分称赞，也期待未来有更多机会在这里开展东西音乐的对话。

科技碰撞音乐，带来不一样的破壁体验

在上海音乐厅四楼举办的文化空

间，“真情无界——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声音交互艺术体验大展”已正式开幕。展览共分三个“贝多芬的色彩”“贝多芬的影像”“贝多芬的独白”三个章节，十个展区贯穿贝多芬生平、音乐作品和人生故事，其间穿插融合沉浸式科技互动、交互式视觉投影，配合交响乐团专门为此次展览录制的贝多芬交响乐作品，给观众呈现多维度的声音交互艺术感官之旅。

展览首先映入眼帘的是“贝多芬的色彩”展区。巨大的投影墙上，不同色彩的光影随着《命运交响曲》的节奏错落绽放，轻轻触摸幕墙时，一阵阵涟漪还会根据不同乐章呈现不同效果。而在其他展区，全息、激光、装置等“新玩法”，都将赋予贝多芬的音乐“科技范儿”。

“我们希望观众在上海音乐厅，不仅能听到名家名团，也能在座间感受音乐和技术的互动，让这座上海文化地标以更多元的面貌与市民互动。”方

国产影视作品能为民族产业带来怎样的燃爆点？

国的文化，更是在韩国以外培养了“韩国制造”的消费市场。相比之下，国产影视行业尚不具备这方面的意识。

意识的缺乏首先源自认知的不到位。在胡娜看来，仅仅就文化产品本身而言，其直接经济贡献是很小的。但文化产品有一个区别于其他产品的重要特征，就是它能够潜移默化影响人的心理和观念，并以此影响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，从而产生强大的外部辐射性，带动各种经济业态的协同共生。这也正是各国政府都重视文化产业的原因。“影视产业更是如此。但现在我们很多相关领域的从业人员对这点缺乏足够认知。”

在权衡看来，影视剧具有双重属性，一方面引领文化价值导向，一方面体现市场经济规律。影视产品的功能，决定了它要带动很多市场消费点，但这绝不仅仅体现在“某某同款”的热卖上。一部

影视作品，其实蕴藏着无数的产业增长点，也蕴藏着无数的循环节点。通过影视热播折射出其它产业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形象，进而挖掘出对应产品的商业价值和需求态势，这样一来，就在影视和其它产业之间建立起了勾连，真正做大了产业链，实现了产业链的优化和延伸，放大了每个环节的附加值。

要为民族产业代言，影视剧需展现中国人的人生

解决了认知问题，还要解决实际操作问题。研究者有个共识：影视产业要真正发挥出辐射和带动作用，离不开好的作品。如果作品本身是悬浮的，缺乏说服力的，那观众自然不会认同剧中植入的价值理念。具体到什么样的影视作品能够为本

地本国的民族产业代言，答案首先是具有鲜明的国家文化特质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长期研究影视作品，她注意到一个现象：韩剧无论是表现古代人还是太空人，都无一以贯之的“韩国性”，吃的是韩国的方便面，用的是韩国的手机，度蜜月去济州岛。日剧的情形也相似。“而很多国产剧，主人公只用西餐和北海道来抒情，最能表达年轻人感情的画面，都被欧美和日韩符号取代。”因此，毛尖认为，在要求影视剧为民族产业代言之前，首先需在影视剧里建构中国人的空间，展现中国人的人生，培养我们的民族感情。

有一个观点得到学者的普遍认同：影视作品对生产和消费产生拉动作用，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，不仅需要创作好的作品，还需要研究影视作品和民族产业更好的结合方式，以及结合之后更好传播的路径，而不是简单的产品植入。这是一篇大文章，需要耐心，需要多产业多部门的联动，也需要从现在开始落笔。